

中華學術叢書

柳存仁著

和風堂文集

中華學術叢

柳存仁著

和風堂文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柳存仁

一九一七年生於北京，華裔澳大利亞學者。北京大學文學士，曾獲倫敦大學榮譽學士，哲學博士及文學博士學位，近年又接受南朝鮮嶺南大學、香港大學和澳大利亞默克大學的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講座教授，亞洲研究學院院長，現任名譽教授；又曾被選為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院士，英國及北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會員。其研究集中在道教史、明清小說及中國古籍方面，對許多領域的考證有突破性貢獻。西文著述有《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吳承恩》等書。本書反映了作者主要的學術成就。



作者像(一九八三年，在堪培拉)



作者與陳寅恪先生合影(一九四九年夏，在廣州)



一九八九年三月作者在西澳洲默篤克大學  
接受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 唐以前符遯考

道藏一五〇唐世真仙體道程履集卷二青。謀世。條，此有後世所謂靈室淨廟  
一派之遺教有闕。其傳世中之主要人物，則符遯，吳猛，蘭公及魏祖四人，而尤以符  
遯之事迹記載似多周而實非全周，稱其出入之靈，或亦可稍窺宗教故事傳藝藝術變之  
源也。於所符遯，其教稱相且撰人有三五者為白玉鍊玉片其所以之符傳符真仙傳（道  
藏一二七，八竹真十書卷三十三一四），其書文字交情，故事丹輪大伴是同道藏二〇〇所收之  
無名氏符真仙傳，意者白天之書或由仙傳數術而成，以其視仙傳稍不增進，而又自符真仙  
有不少完全一致之處也。（玉降集有單行元建安全火動有堂刻本，見黃濬普慶系文獻書目  
知見錄，一九七八竹打書，頁一五八，恐未見原書。但道藏本類則錯字，多可用道藏與符真  
仙傳同冊之西山符真卷八十五化錄核正。如玉降集符傳注<sup>33/10</sup>中，行有符書，攝化錄卷  
上<sup>100</sup>注為。玉降道士張中行符書，又如<sup>33/10</sup>注。攝書識方乘雲龍江在書注西  
岸，化錄上<sup>101</sup>則作。攝書識方乘云：龍沙在……，故亦可據其。）白氏作符傳無  
撰述年月，然玉降集有蘭公山崇真宮吳天殿記（<sup>33/10</sup>），文內有真建唐辰（一二二〇）  
身符，漢<sup>33/10</sup>序記（<sup>33/10</sup>）文內有真建唐辰（一二一八）年分，符傳之條，為神或相去  
不遠，而六十五化符有丙午（辛，淳祐丙午，一二四六）故文，亦南定間書也。

## 序

研究傳統的中國學問，就是在中國本土，由有經驗的中國學者們努力爬羅剔抉，就前人的業績上去蕪存菁，希望能夠在一個可以預計的時期內在某一方面做出一點成績來，成就也非易易；何況僻居海外，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裏，圖書皮藏，既不敢說是完備，師友切磋，往往也只限於少數常見面的人，比起《莊子》說的「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那真是相去很遠的了。我工作差不多有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那麼長的時間的學院，大學裏叫做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者，說中文我平常總是管它叫亞洲學院。近年也有人把它翻譯做亞洲研究院的，字面上說，倒也不錯，我也不好改正它，因為 Study 這個詞，雖指學習，也還有深入調查研究的意義。可是我這個食古不化的頭腦，聽了這個名稱，就常會想起《三國志》裏駱統上表給孫權替張溫辯白說的「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這幾句話來。我想說研究真地談何容易！潛神留思，纖粗研核，做得到麼？

中國有記錄的歷史的年代，本來就比許多別的國家、民族的來得長；這還不包括考古和史前史的知識在內呢。單只就古籍兩個字的範圍內說，從《五經》開始直到清代人的各種著述，細大不捐地都包羅在內，那簡直汗牛馬、充棟宇都不足以形容它的繁博。文字的體製當然十成裏有九成以上全



是文言的，這文言有的是比較不易容易看的散文，雖然其中也不免夾雜着一些從前的讀書人認為應該是常識的所謂典故（那超出常識以外的算是僻典）；但是散文之外，還有駢儷的文字，它們不止在文學史上曾經開創過一個很長的時期的燦爛局面，就是在實用文字方面，像傳記、詔書、奏章、公牘，甚至茶餘酒後的遊戲文章，也要佔很重要的席位。我們都是現代人，現代社會在物質和精神方面所產生的巨大變化和衝擊遠非十九世紀或本世紀初期以前的人所能夢及。時代的差距那變遠，相形之下，我們對於這些古典著作的理解、體會，恐怕不但不似兩三千年來生存在那樣的文化環境裏的古人那樣自然，就是和六七十年前的人們相比較，也難免有望塵莫及的地方。話雖如此，現代的學者們也有他們的幸運之處。隨着時代的進步，研究中國過去的歷史、文物，在近幾十年來似乎已經成爲世界上的「顯學」了。中國語文在世界各地普遍地有人學習，有些國家的大城市甚至在中小學都已經開班嘗試。從語言進一步到文學、歷史、哲學思想、社會、經濟……，每年都有不少嶄新的出版物。量的方面固然可觀，質的方面有些著作也着實比一百幾十年前的西方漢學大有進境。資料的交換，研究方法的觀摩溝通，當然也會給中國的青年學者們一些刺激。

中國的古籍既然那麼多，性質那麼駁雜，研究起來最好一方面要明瞭它們的分類，一方面也先得知道一下它們的總值或全貌。簡括地說，這種基本的知識就是所謂目錄之學。目錄學這個名稱，似乎也有廣狹兩義。廣義的目錄學，其實也可以叫做目錄學史，它的範圍可以從漢代的《七略》、《別錄》的流變講起，主要在說明歷代圖書的沿革性質，研究的重點是古重於今的。狹義的目錄學，比較

地更實用一些，就是研究需要時我們今天所能夠接觸到的現存的古籍的分類目錄。這種目錄當然伸縮性是很大的：大的圖書館收藏豐富，藏書家私人的書目也很可觀，小的像過去各地舊書肆盛時，每一家書鋪自己刻印送給顧客的書目（上面還有定價和一些關於板本的零碎說明），也能够增加一般學者們對古籍的認識。從前胡適之先生（適）常對人說北京琉璃廠、隆福寺的幾家舊書店的學徒和小夥計他們對舊書所有的知識，就遠勝過一個剛從國文系畢業的大學生。他這話並非全沒有道理，但是書鋪的學徒假如完全不讀書，他所有的知識只是一種機械性的檢索的知識罷了，仍舊不能真正應用到對書籍內容的理解上面。我們研治古代的學問、運用古籍的人，基本入手處是知道（一）究竟有些什麼古書，它們的性質是怎樣的？（二）這些古書傳統的方法向來是怎樣把它們分類的？和（三）這些類別爲什麼要這樣分，它們相互之間有沒有關係？如果有關係，有的是怎樣一種關係？要想滿足我們這幾個要求，〈四庫全書總目〉（〈四庫提要〉）依然是一部可以供我們利用的敲門磚。

〈四庫全書〉是清初帝王統治時代完成的一部只有少量手鈔本的大叢書，皮藏它的文淵閣、文瀾閣……本身就是專門儲藏它的圖書館。它雖然未必能够包含當時所有的古書的全部（大家知道收在裏面的還有刪削竄改的情況），但是它的分類的確可以說是傳統的古書分類的最後一張細目，說不定也可以說是一張考慮得很周詳的細目，這在從前的人說是無疑的。當然，爲了古書分類的問題十分複雜，〈四庫提要〉本身自然也有許多照顧不到或安排失當的地方，等於現代人假如想把一個巨

大的工作單位的建制或工作系統列出一個各如其分却又別無遺漏的綱目時，也常常會有躊躇、斟酌或事後不滿意的某種情形一樣。不過就大體說，我們要熟悉從遠古直到清初古書的性質，更從它們的分類細節去體會、摸索、尋檢其他的並不一定包括在「四庫」裏面的書籍，「四庫提要」無論如何是不能够不細讀的。漢代著錄書籍本分七部，西晉以後開始有分甲、乙……等四部的，但是當時的乙部是諸子，丙部纔是「史記」這些書，和後來通行的經、史、子、集的分類還不相應。經、史、子、集是唐初的分法，「隋書」是唐初編纂的，它的「經籍志」已開始這樣做，「四庫」的次序就是承襲着這個傳統而來的。現在我們姑且拿「四庫提要」的史部做個例子，看看那裏面究竟包括些什麼。「提要」的卷四十五到四十六是正史類，卷四十七到四十八是編年類，卷四十九是紀事本末類，卷五十是別史類（收的像「東觀漢記」、「建康實錄」這些書）；卷五十一到五十四是雜史類（收的像「國語」、「戰國策」、「貞觀政要」這些書），卷五十五到五十六是詔令、奏議類，卷五十七到六十四是傳記類，卷六十五是史鈔類（例如南宋呂祖謙編的「十七史詳節」），卷六十六是載記類（指敘述帝王時期一些割據爭霸的政權的史籍），卷六十七是時令類（古代農業社會，民間的行事需要運用曆法天文的知識。這種知識由政府頒布，故曰時令），卷六十八到七十八是地理類，卷七十九到八十是職官類，卷八十一到八十四是政書類（指制度、法令、典禮這些），卷八十五到八十七是目錄類（分經籍和金石兩類，後者包括考古、法帖這些），最後卷八十八到九十是史評類。其中某類卷帙比較繁重的，內容也就很雜。譬如地理，它又細分做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蹟、遊記、雜記、外紀這些子目，外紀指的是屬地或

外國。我這裏只舉史部的分類，其他經、子、集三個部門，當然也有它們的目目，分類也很繁細；這把《提要》卷首的目錄翻看一下就知道了。不過重要的還不在需要太詳細地記得它的目錄（這慢慢地多翻幾十遍總會熟悉的），要緊的是要知道那些記錄在《提要》裏面的許多書的內容。《提要》之比其他書目更有用，就在它能夠教我們未讀一部書之前先大略知道一下這部書講的是些什麼；讀了它再讀它前後有關的別的書的提要，我們就大體能知道某一類的書籍的性質了。這些一篇篇的長短不齊的提要，也不一定篇篇全是寫得十分確當的，但是它大概不會比近世學者們寫的什麼書目解題之類的入門書更弱，而《提要》所包含的書籍之廣博，却遠在許多近人的著述之上。現代的史家余季豫先生（嘉錫）有《四庫提要辨證》二十四卷，是讀《提要》的人同時必備的參考書。余先生的考證，是很精密的，他的大著裏雖然僅敘及大約五百種書的樣子，這恐怕已經很够讀者們取樣的了。余先生每批評一篇《提要》，必定先引原文一段，然後在引文後面低一格逐段寫他自己的長短按語。這也是很方便讀者對照的。在幾十年前，已是民國時代了，《四庫》的本子還不會流通，有些罕見的或平常讀書人未必有力購置的書，或居住在大圖書館不多的地方，參考就很困難。近年影印的技術更進步，應用更廣，《四庫珍本》之外，《四庫全書》本身也影印出來了，我們讀了《四庫提要》要檢原書，就比前人方便多了。有了《提要》和余先生撰的《辨證》，基本本地熟悉《四庫》的內容，我們運用古籍的能力就比較地有些把握了！

我們讀了余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就知道《提要》固然給我們許多方便，它們也有不少個別的

缺失。其實，不但《提要》的內容，就是《四庫》的分類子目，像我在前面所約略提過的，也何嘗沒有令我們困惑的地方。如果不熟諳《提要》全書的組織，只是在需要時輕略地索檢，勞而無功的、繞着彎子白走一大截路的情況，是我們初學的人常常會遇到的，也常常會令我們感到困頓、挫折，甚至望洋興歎。這不一定是我們的古人沒有分析的一方面，而是歷史、文化和環境造成的一種文物觀念的凝聚性，就像有些民族的語言構造能把許多觀念綜合在一個詞裏，或者一個詞就等於是一句話那樣（雖然漢語的結構不是這樣）。中國在秦漢以前的許多古書基本就是一部散寫的總集，像《墨子》，既有《尚賢》、《尚同》、《兼愛》……那些講政治思想的篇章，又有《備城門》、《備高臨》這些講守城的篇章，而《墨經》更似乎是從形式邏輯到物理無所不包的著作。像《呂氏春秋》和後來的《淮南子》這些「兼儒、墨，合名、法」，古人本來就把它歸在雜家類的書籍，更不用說了。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現在保存的是一部散佚不完、文字頗多訛謬的古籍了，它的本旨我們總該承認是一部闡揚《春秋》公羊一派學說的重要著作。但是它又雜陰陽五行，在它的《循天之道》篇裏，居然還談到男女應該在什麼生理條件下纔交接，多少日子纔「游於房」這類性衛生的話。有了這樣的對書籍和篇章的觀念，像《四庫》那樣的分類，恐怕已經要算是儘可能的能够實用的分列辦法了。論典章制度的書，大家都聽說過《三通》乃至《九通》、《十通》這一套。《通典》和《文獻通考》、《四庫》都收在史部政書類，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在《提要》的政書類裏，却找不到《三通》裏剩下的另一部鄭樵《通志》。原來《通志》是收在別史類的，因為它除了著名的《二十略》之外，還有一部通史性質的帝王本紀、后妃傳、年

譜、世家、列傳、載記等一百四十八卷的文字，所以就入於彼而不入於此了。這一類分門別類細細斟酌的情況，是非讀《提要》的文字，不能夠貫通的，雖然這裏所說的貫通，我指的並不是真地學問淹博，只是在迷宮裏的一條錯綜曲折的路徑上多走過幾次，熟能生巧，不致於每一回都碰壁罷了。一百幾十年前的西方的漢學家，從 Abel Rémusat (一七八八——一八三二) 到 Alexander Wylie (一八一五——一八八七) 沒有一個人不勸人注重《四庫提要》的。Wylie 的那一部著名的《中國文學劄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1867)，實際上就是《提要》的英文版簡編，不過包括的書名不像原著那麼多，改寫的提要也沒有原著那麼豐贍罷了。我曾嘗試把 Wylie 的書裏所列的分類和原著對照一下，許多項目都翻譯得不錯，有的像地理類，他譯做 Geography and Topography (地理和地志)，時令類他譯做 Chronography，後者雖然不十分恰當，也可算頗具匠心。書裏有許多類，還添進了一些在十九世紀中葉看得到的其他書籍。《四庫》的子部雜家類存目本來錄有利瑪竇(Matteo Ricci)、龐迪我(Didacus de Pantoja)、艾儒略(Julius Aleni)、畢方濟(Franciscus Sambiasi)的著述，這裏就添了幾十種，多是十七、十八世紀時的宗教讀物。地理類裏又有汪文泰的《紅毛番英吉利考略》；這書原名是《紅毛番喚咭利考略》，纔一卷，汪文泰輯，收在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王蘊香編的《域外叢書》裏。Wylie 記這書是一八四一年出版的，如果不是他錯誤，也許這書先有單刻本也說不定。魏源的《海國圖志》出版僅在《喚咭利考略》之後兩年，Wylie 的書裏批評他態度「誇大」，却比較推崇徐繼畲的《瀛環志略》。這些都是當時的時務

書了。在天文算法類裏 Wylie 還特別推崇過李銳（一七六五——一八一四）的著作，說他「可能是本世紀裏最超越的數學家」，雖然書中很疏忽竟忘記寫下李銳的漢文名字。李銳著名的《李氏遺書》，是道光三年（一八二二）阮元刻的。我們不要忘記 Wylie 自己也是科學知識很豐富的人，他曾跟另外一位清末的數學家李善蘭一同翻譯出版過《續幾何原本》、《談天》、《代微積拾級》等書。

我現在再舉一個小例子，說明看《四庫提要》對一些看似無關的研究方向用處。近年頗有不少人在進行研究《金瓶梅詞話》，也有人研究《西遊記》小說的一個清初的版本——《西遊證道書》。這《西遊證道書》，孫子書先生（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五裏記載日本內閣文庫藏的原刻本，題「西陵殘夢道人汪澹漪箋評」，「鍾山半非居士黃笑蒼印正」。《四庫》裏面既然不收章回體白話小說（卷二百四十到一百四十四稱為小說類的錄的全是些雜史性質的書目），看來在《四庫提要》裏不會找到有關汪、黃的線索了。然而事實却不全是這樣。《四庫提要》卷一九四、總集存目四就收有徐士俊、汪洪同編的《尺牘新語》二十四卷，《提要》說「士俊字野君，洪字瞻漪，竝錢塘人。是編刻於康熙癸卯，採明末國初各家尺牘」。這裏的瞻漪是澹漪的誤刻，癸卯是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分類尺牘新語》還有《二編》和《廣編》，分別刻於康熙六年和七年，是汪洪、徐士俊和黃周星（笑蒼）三個人合作的出版物。黃周星的著述很多，《夏為堂集》之外，《昭代叢書》、《檀几叢書》裏就收了不少，這兩個叢書裏也收徐士俊的其他著作；士俊著的雜劇、傳奇，又收在《盛明雜劇》和《曲波傳奇二種》裏。近年美國的 Ellen Widmer 教授研究《西遊證道書》，就利用這三編的《尺牘新語》的材料，證明他們刻

的《證道書》是在康熙癸卯間出現的。這部《尺牘新語》雖然收錄在《提要》的總集存目裏，但是流傳甚希，因為它還是清初的禁書，見《軍機處奏准全燬書目》。

研究《金瓶梅詞話》，尤其是考證它的作者，近年在各地是很熱門的了。明代屠本峻的《山林經濟籍》卷八《燕史固書》裏記載他所見的《金瓶梅》的抄本，說：「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往予過金壇，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貲購抄本二帙。予讀之，語句宛似羅貫中筆。復從王徵君百穀家，又見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王鳳洲大家知道是王世貞，這位曾經被懷疑，後來又被否定是《金瓶梅》的作者的大名，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了。王百穀就是王穉登，《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有傳，他是嘉、隆、萬曆間蘇州的布衣名士，也是比較知名的。《穉登是詩人，《明史》說他「刻《燕市》、《客越》二集」，《四庫》僅藝術類和小說類存目裏提到他關於品畫和里社祀神的書，他的《王百穀集》就被打落《全燬書目》裏面了。幸而萬曆刻本的《王穉登全集》是個漏網之魚，現在還保存。）王宇泰的名字較生，若說他就是嘉靖到萬曆間的大醫生王肯堂，聽見過他的人就很多了。肯堂是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進士，後來也做到福建布政司、參政這些大官，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對醫學方面的貢獻。他的《證治準繩》一百二十卷在中國醫學史上是一部有醫科全書規模的大書，《四庫提要》卷一〇四裏也曾加著錄。《提要》卷一〇五醫家類存目收有清初武之望撰的《濟陰綱目》，是完全因襲《證治準繩》裏女科那一部分的，這書且有汪洪作的箋釋。原來汪洪他們刻書的範圍很廣，小說、醫書大概都是他們印行的能够深入社會廣大的讀者羣的著作。汪洪撰的《慈幼綱目》、《保生碎事》這些醫書，也



用了不少王肯堂的材料。王肯堂在他的時代是一位很開通的人。他相信儒家和佛教的見解可以溝通，甚至說「教習、庶吉士當令看『楞嚴經』」，他也曾和利瑪竇、龐迪我這些西洋教士交遊。《山林經濟籍》說他用重資購抄本《金瓶梅》，自然也不奇怪了。近來學者像劉輝先生研究《金瓶梅》已注意到王肯堂的《鬱岡齋筆塵》（見劉著《北圖館藏《山林經濟籍》與《金瓶梅》》，刊《文獻》一九八五，第二期，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曾加引用。劉先生用的《筆塵》是四卷本，這和陶奭所編的《續說郛》局十四所收的一卷《筆塵》大不相同了。我們未見過原書的人，最早知道《筆塵》有四卷本，恐怕也得拜《四庫提要》卷一二八的記錄之賜。

以上我概括地說明《四庫提要》對我們研治古典著作的重要性，只是希望我們誠實地使用它做步上初階的敲門磚，並不是說它毫無缺點，却是說其他的清末學者們以為可以供做入門參考的書，像張之洞（穆荃孫幫忙同撰）的《書目答問》，雖然可以教初學畧識四部的門類，可是它對各部書籍的內容，却不會解說，只是舉出精校精注善本這一點對當時的讀書人可以說有貢獻。《書目答問》刊行之後幾十年，又有范來研先生（希曾）的《書目答問補正》，更在版本方面，多所補充，還加入了一些民國以來的影印本和好的排印本，極為柳翼謀先生（詒徵）所稱道。但是《四庫提要》的作用，即使這樣也還不會消失。例如我們說南宋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有衢州本和袁州本兩種版本，這就是《書目答問》也已經把它們分別開來了。但是這書衢州本有二十卷；袁州本四卷，後志二卷，是晁公武名下，考異一卷，附志一卷，是趙希弁名下的。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范先生的《補正》還推薦了光